

目摇摇录

■摇摇摇 ■摇摇摇

绪论	(员)
第一章摇先秦时期的湖南教育	(员)
第一节摇先秦时期的湖南教育概述	(圆)
摇摇一、远古至商周时期的湖南教育	(圆)
摇摇二、楚国时期的湖南教育	(愿)
第二节摇商周楚国时期湖南的教育人物	(员)
摇摇一、鬻熊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员)
摇摇二、申叔时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员)
第二章摇两汉隋唐时期的湖南教育	(员)
第一节摇两汉时期的湖南教育	(员)
摇摇一、两汉时期的湖南教育概述	(员)
摇摇二、贾谊的教育思想及其影响	(员)
第二节摇隋唐时期的湖南教育	(圆)
摇摇一、隋唐时期的湖南教育概述	(圆)
摇摇二、隋唐时期科举制创立与湖南的科举	(圆)
摇摇三、柳宗元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圆)
第三章摇宋元时期的湖南教育	(猿)
第一节摇宋元时期的湖南教育概述	(猿)
摇摇一、两宋时期湖南教育的昌盛	(猿)
摇摇二、元代湖南教育的曲折发展	(猿)
第二节摇宋元时期的湖南科举	(源)
摇摇一、宋代的湖南科举	(源)
摇摇二、元代的湖南科举	(源)
第三节摇宋元时期湖南的教育家	(源)
摇摇一、周敦颐的教育思想	(源)
摇摇二、胡宏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源)
摇摇三、张□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源)
第四章摇明清时期的湖南教育	(缘)
第一节摇明清时期的湖南教育概述	(缘)
摇摇一、明清时期湖南地方学校教育的逐步发展	(缘)
摇摇二、明清时期湖南的书院教育	(远)
第二节摇明清时期的湖南科举	(远)

摇摇一、明代的湖南科举	(远缘)
摇摇二、清代的湖南科举	(远)
第三节 摇摇王夫之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	(远愿)
第五章 摇摇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教育 (远愿园~ 远愿四)	(苑苑)
第一节 摇摇鸦片战争后湖南传统教育的变革	(苑苑)
摇摇一、湖湘经世学派对传统教育流弊的批判	(苑苑)
摇摇二、传统教育的改革与新式教育的萌芽	(苑怨)
第二节 摇摇甲午战争前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轫	(愿袁)
摇摇一、浏阳算学社与湘乡东山精舍	(愿袁)
摇摇二、湖南时务学堂	(愿缘)
摇摇三、陈宝箴改求贤书院为武备学堂	(愿怨)
第三节 摇摇戊戌政变后湖南近代教育的挫折	(怨园)
摇摇一、戊戌政变后湖南教育的特点	(怨园)
摇摇二、政变后趋新特色维持的原因	(怨袁)
第六章 摇摇清末新政时期的湖南教育 (远愿四~ 远愿五)	(怨缘)
第一节 摇摇传统教育的解体与新学制的建立	(怨缘)
摇摇一、张百熙与新学制的建立	(怨缘)
摇摇二、改书院为学堂	(怨苑)
摇摇三、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	(怨愿)
第二节 摇摇师范教育的崛起与中小学办学体系的形成	(怨怨)
摇摇一、选派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及留日运动的兴起	(怨怨)
摇摇二、设立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	(远园)
摇摇三、建立优级师范学堂	(远园)
摇摇四、官立、公立、私立和教会中学堂的发展	(远猿)
摇摇五、小学堂的发展	(远源)
第三节 摇摇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和其他各类教育的兴办	(远缘)
摇摇一、高等教育	(远缘)
摇摇二、实业教育	(远远)
摇摇三、幼儿教育及其他教育	(远苑)
第四节 摇摇清末湖南的教育思潮与学生运动	(远怨)
摇摇一、流传湖南的主要教育思潮	(远怨)
摇摇二、清末湖南的学生运动和风潮	(远员)
第七章 摇摇民国初期的湖南教育 (远愿四~ 远愿四)	(远园)
第一节 摇摇教育体制的改革、教学革新与师资建设	(远园)
摇摇一、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远园)
摇摇二、学制的逐步完善	(远源)
摇摇三、教育投资体制的确立	(远远)
摇摇四、教育内容、方法的改革和师资建设	(远苑)
第二节 摇摇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远愿)

摇摇三、湖南大学和湘雅医学院的艰苦办学	(员缘)
摇摇四、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	(员远)
摇摇五、朱经农与湖南教育	(员苑)
第四节摇解放战争时期湖南教育的困境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兴起	(员愿)
摇摇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南教育事业的复员、恢复和发展	(员愿)
摇摇二、内战爆发与湖南教育的危机	(员怨)
摇摇三、湖南教育界的爱国民主运动	(员怨)
第十章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湖南教育 (员圆- 员缘)	(员圆)
第一节摇接管、改造旧有学校与争取、团结旧有学校的教职员工	(员圆)
摇摇一、接管、改造旧有学校	(员圆)
摇摇二、争取、团结旧有学校的教职员工	(员猿)
第二节摇贯彻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	(员源)
摇摇一、各级学校向工农和少数民族子女开门	(员源)
摇摇二、开展工农成人教育	(员源)
摇摇三、民办学校的出现	(员苑)
第三节摇调整、整顿学校设置和管理体制	(员苑)
摇摇一、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	(员愿)
摇摇二、中、初等学校的调整、整顿	(员愿)
摇摇三、重点中学的创办	(员愿)
摇摇四、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	(员愿)
第四节摇学习苏联,改进教学	(员怨)
第十一章摇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湖南教育 (员缘- 员怨)	(员缘)
第一节摇教育方针的实施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员缘)
摇摇一、教育方针的实施	(员缘)
摇摇二、教育界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员缘)
第二节摇教育“大跃进”和“教育革命”	(员远)
摇摇一、教育“大跃进”	(员远)
摇摇二、“教育革命”	(员愿)
第三节摇湖南教育战线的纠“左”和“反右倾”运动	(员怨)
摇摇一、教育战线的纠“左”	(员怨)
摇摇二、教育战线的“反右倾”	(员圆)
第四节摇“八字方针”的实施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	(员圆)
摇摇一、“八字方针”的实施	(员圆)
摇摇二、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	(员圆)
第五节“三个条例”的实施和“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体制的建立	(员圆)
摇摇一、“三个条例”的实施	(员圆)
摇摇二、“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体制的建立	(员圆)
第十二章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湖南教育 (员圆- 员怨)	(员圆)

第一节 摇教育界内乱的肇始和蔓延	(页码)
第二节 摇“革命大联合”与“斗批改”及“教育革命”	(页码)
摇摇一、“革命大联合”	(页码)
摇摇二、“斗批改”	(页码)
摇摇三、“教育革命”	(页码)
第三节 摇十年内乱对湖南教育的严重破坏	(页码)
第四节 摇湖南教育界对林彪、“四人帮”的抗争	(页码)
摇摇一、两次“整顿”与两次“反复辟”	(页码)
摇摇二、反对围剿《园丁之歌》的斗争	(页码)
摇摇三、三个“坚持”的抗争方式	(页码)
第十三章 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湖南教育(上)(页码~ 页码)	(页码)
第一节 摇拨乱反正与调整整顿	(页码)
摇摇一、指导思想的匡正与教学秩序的复建	(页码)
摇摇二、推广桃江经验与推动重教兴教	(页码)
摇摇三、平反冤假错案与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页码)
摇摇四、调整教师队伍与各类教育事业	(页码)
第二节 摇全面建设与改革的部署	(页码)
摇摇一、 页码年的东安会议揭开全面建设和改革的序幕	(页码)
摇摇二、 页码年长沙会议全面部署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页码)
摇摇三、 页码年郴县会议推进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页码)
摇摇四、 页码年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页码)
摇摇五、 页码年的全省教育科技工作会议就新世纪初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作出部署	(页码)
摇摇六、王向天与湖南教育改革	(页码)
第三节 摇积极推进“普九”、“扫盲”工程	(页码)
摇摇一、普及小学教育	(页码)
摇摇二、制定“双基”法规	(页码)
摇摇三、两次“普九”会议	(页码)
摇摇四、调整中小学布局	(页码)
摇摇五、改造薄弱学校	(页码)
摇摇六、发展特殊教育	(页码)
摇摇七、“扫盲”工程的顺利进展	(页码)
摇摇八、督导评估制度对“普九”工程的推进	(页码)
第四节 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城乡教育综合改革	(页码)
摇摇一、职业中学的改革和发展	(页码)
摇摇二、中等专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页码)
摇摇三、高等职业教育的起步	(页码)
摇摇四、郴县、怀化、邵阳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页码)
摇摇五、省会长沙的城市教育综合改革	(页码)

第五节摇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圆苑苑)
摇摇一、愿年代以来湖南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	(圆苑苑)
摇摇二、规模的扩大与观念的转变	(圆苑苑)
摇摇三、体制改革与教学改革	(圆苑苑)
摇摇四、科技研究与产业发展	(圆苑苑)
摇摇五、学位工作与研究生工作改革	(圆苑苑)
摇摇六、“圆工程”建设	(圆苑苑)
摇摇七、现代远程教育的兴起	(圆苑苑)
第六节摇成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圆苑苑)
摇摇一、干部、职工的文化和技术基础教育	(圆苑苑)
摇摇二、农民的文化、技术基础教育	(圆苑苑)
摇摇三、干部、职工的中、高等学历教育	(圆苑苑)
摇摇四、成人继续教育	(圆苑苑)
第七节摇普通高中和幼儿教育的发展	(圆苑苑)
摇摇一、普通高中的改革和提高	(圆苑苑)
摇摇二、幼儿教育的发展	(圆苑苑)
第十四章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湖南教育(下)(圆苑苑~圆苑苑)	(圆苑苑)
第一节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保证教育经费的不断增长和来源稳定	(圆苑苑)
摇摇一、师资队伍建设	(圆苑苑)
摇摇二、教育经费筹措	(圆苑苑)
第二节摇教育思想的更新和教学研究的深入	(圆苑苑)
摇摇一、愿年代初期教育思想的突破与教育创新	(圆苑苑)
摇摇二、愿年代中后期教学研究与改革的蓬勃发展	(圆苑苑)
摇摇三、愿年代教育科研与成果推广的全面开展和制度化、经常化	(圆苑苑)
摇摇四、湖南素质教育之花：汨罗经验	(圆苑苑)
第三节摇对少数民族教育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	(圆苑苑)
摇摇一、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和总体对策	(圆苑苑)
摇摇二、特殊政策和措施的实施	(圆苑苑)
摇摇三、特殊政策和措施加快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	(圆苑苑)
第四节摇发展社会力量办学	(圆苑苑)
摇摇一、湖南社会力量办学的基本脉络	(圆苑苑)
摇摇二、湖南社会力量办学的基本优势	(圆苑苑)
摇摇三、社会力量办学的社会效益	(圆苑苑)
第五节摇加强对外开放	(圆苑苑)
摇摇一、湖南教育对外开放的大体轮廓	(圆苑苑)
摇摇二、湖南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	(圆苑苑)
摇摇三、对外开放对湖南教育的促进	(圆苑苑)
后摇记	(圆苑苑)

绪摇摇论

■摇摇

摇摇■

摇摇古代湖南的疆域建制始见于史籍者为“三苗之国”与“荆蛮”。前者与尧、舜、禹同时，后者与夏、商、西周同时。“三苗国”大致在今河南南部，安徽西南部和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之地，而湖南特别是洞庭湖至长沙一带则为其分布和活动的重要地域和中心地带。“荆蛮”则地跨湖北、湖南二省及其邻近地区。

春秋初期，楚国开始进入湖南，至战国初年，奄有湖南全省。

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在湖南设长沙、黔中等郡。

西汉分全国为 **员** 州，下设郡、县。湖南属荆州，辖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和长沙国。今湖南全境除江永（当时名“谢沐”）、江华（当时名“冯乘”）二县错入主要领地在今两广的苍梧郡以外，均为当时湖南境内的三郡一国所领辖。东汉除废长沙国为长沙郡外，略同西汉。

三国时期的湖南属吴。吴分其地为 **缘** 州，湖南仍属荆州，境内将东汉的 **源** 郡分为 **愿** 郡，除江永、江华两县仍错入今两广外，作唐（今澧县、安乡县地）、南安（今华容、南县地）二县划入主要领地在湖北的南郡。

西晋湖南境内建制沿袭孙吴。东晋偏安后，湖南分为荆、湘二州，辖 **怨** 郡 **源** 县。

唐朝分全国为 **员** 道，道下州、郡并称，州、郡领县。湖南分属山东南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下辖澧州澧阳郡、岳州巴陵郡、潭州长沙郡、衡州衡阳郡、永州零陵郡、郴州桂阳郡等 **员** 州郡，共领 **缘** 县。原建制错入外省的江永、江华、作唐、南安均回归湖南建制。唐代宗广德二年（**苑**），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领衡、潭、邵、永、道 **缘** 州郡，驻长沙。湖南之名自此始。五代时期湖南的建制略同于唐。

宋朝改道为路。北宋分全国为 **圆** 路，南宋偏安后为 **员** 路。路设安抚司，直隶京师。州、县设置略同于唐。

元朝开始推行省制，中央设中书省，为政务中心，地方设 **员** 个中书行省，简称行省。省下设道、路、州（府）、县各级。湖南大部分地域分属湖广行省的江南湖北道和岭北湖南道，小部分属四川行省。

明朝沿袭元朝省制，但湖南全境均属湖广省，府下的道、路被废，改设府、州、县各级。

清初分全国为 **员** 省，省设布政使司。湖南初属湖广省。康熙三年（**员**）设湖广右布政使司驻长沙，是为湖南建省之始。雍正元年（**员**）改湖广右布政使司为湖南布政使司，湖南建省遂定，境内设 **源** 道、**怨** 府、**源** 直隶州、**缘** 直隶厅，**苑** 个县、**苑** 散州、**员** 散厅。

中华民国时期湖南设置长沙、衡阳两省辖市，**员** 个行政督察区，**苑** 个县，人口

猿万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湖南省内建制几经变易，到公元1956年，全省共设16个省辖市、16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47个县（市、区），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湖南人口为1.29亿。

纵观湖南这片土地上从古至今的教育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起始、初兴、兴盛和现代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四个阶段。

（一）起始阶段。起于远古，终于秦，历时最为久远。其主要特点是：教育处于原始状态，只有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尚未发现有关学校教育的历史记载。

考古证明，远在地质年代的中更新世（距今约10万年至50万年），湖南已有人类活动。1936年和1938年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0000年到15000年的稻谷和陶片，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原始栽培稻谷和原始陶片。1958年发掘的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距今7500~8500年的房屋、陶片和稻谷痕迹；1985~1986年发掘的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的古城和距今7500年的水稻田，比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更早。这些都说明，远古时期湖南已有比较先进的农耕文化，它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应当也是比较先进的。

“荆蛮”时期的殷商、西周已进入青铜时代，并已有官府之学，湖南却仍未发现有关学校教育的记载。这首先是因为当时湖南的生产力水平已落后于殷商、西周。近代湖南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为数较多，且不乏精美之作，但湖南学者对这些青铜器是否为湖南先民所作，尚有歧见，有人认为这些青铜器主要是从中原引进，湖南先民没有创造过自己的青铜文化。其次是湖南当时仍保留着原始氏族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政治国家，因而缺乏政治力量来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春秋初期开始，湖南在楚人的带领下逐步进入封建社会，并于春秋晚期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已出现“孔子门下，弟子三千”，“稷下学宫”，“学士数万”的教育盛况，而湖南仍未发现学校的踪迹。

（二）初兴阶段。始于汉代，止于隋唐五代，历时1400多年。其主要特点是：有了学校教育，但数量不多，分布不广，发展缓慢，且兴废无常，教育质量不高。

西汉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其太学最盛时学生发展到了30万人。郡、国、县、道、邑官学和私学也相当发达。湖南虽然未发现西汉时期的学校记载，但从以下事实推论，西汉时期湖南至少建有培养王侯子弟的宫廷学校：其一，1956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初长沙王丞相利苍夫妇及其儿子墓葬，发现100多种帛书。利苍等人以此陪葬，说明他们对这些书籍是熟悉和爱好的，因而必定受过较好的教育。其二，汉初著名学者贾谊曾任长沙王太傅。虽然贾谊的教育活动并无具体记载，但贾谊在其著作中阐述的教育思想都表现得相当成熟，这说明贾谊在长沙王太傅任内是从事过教育实践活动的。

东汉时期湖南社会稳定，人口增加，经济发展较快，民间学校开始出现。《后汉书·卫飒传》记：光武帝建武三年（127），卫飒“迁桂阳（今耒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壤，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期年间，邦俗从化”。这是关于湖南学校教育的最早的具体记载。此后还陆续有一些记载，但为数不多。

三国孙吴统治时期，湖南未见官学记载，而灵柩近年长沙出土的孙吴时期竹简、木牍记载，孙吴政权曾严禁私学。西晋时期，湖南虽有关于学校的记载，但寥若晨星。东晋初，晋元帝下令各州“秀才须入京策试”，而湘州刺史甘卓上疏说：湘州“往遭寇乱，学校久替，人士流播”，请求秀才策试暂免举行。后因“朝议不许”，甘卓只能“精加隐括，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送京参加策试。社会相对稳定的南朝时期，湖南的学校教育比东西晋亦只略胜一筹而已。

重新统一中国的隋唐时期，湖南社会稳定，生产发达。因而教育开始比较广泛地发展，官学举办较多，私学日见兴盛，书院开始萌芽。特别是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为永州司马灵柩年，影响湘南一度成为湖南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但隋唐五代湖南的教育与政治经济发展相比，仍呈严重滞后之势。学子中虽有宁远人李□高中状元，但进士中式人数仍然稀少。在唐代众多的文化名人中，湖南仅欧阳询父子、怀素三位书法家和胡曾、李群玉等几位二三流诗人。

（三）兴盛阶段。始于宋代，迄于灵柩源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历时灵柩国多年。其主要特点是：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长盛不衰，教育质量显著提高，人才日益兴盛。

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始于唐而完成于宋，至南宋则政治、经济重心均已南移，这就为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宋代湖南的官学基本普及，私学广泛兴起，两宋共有书院灵柩所，并拥有全国著名的岳麓、石鼓两书院。教育质量优良，进士中式人数为唐代的猿猿倍。明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共为宋代学者灵柩人立有学案，其中湖南灵柩人，居全国第五位，湖南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可谓□□盛矣！元代湖南官学的普及仅稍逊于宋，书院灵柩所，与南宋持平。元代新创的社学比较发达。进士中式人数近灵柩人，跃居全国先进行列。明代无论官学、书院和私学都超过宋元，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的发展。明代还出现了湖南历史上第一个人才高峰。根据《湖南古代人才统计表》，明代湖南人才为灵柩人，为明代以前湖南人才总数灵柩人的灵柩，其中官至尚书以上者猿人，刘三吾、夏原吉、李东阳、刘大夏、李腾芳、杨嗣昌等^①，业绩非凡，名重一时。

清代官学普及，书院繁兴，私学遍布城乡，湖南教育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从灵柩世纪灵柩年代开始到灵柩年辛亥革命前后，湖南相继出现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和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四个人才群体，加上灵柩年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五个人才群体，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长期左右全局的作用。

（四）现代教育的兴起与发展阶段。始于灵柩源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迄于本书记述下限的公元灵柩年，历时灵柩余年。

公元灵柩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中国教育事业面临的严重任务是，将只重人文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且积弊丛生的旧传统教育，转变为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现代教育。但湖南自宋朝以来，经济上逐步成为农业大省，思想文化上成为“理学之邦”，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思想和儒家的纲常伦理在湖南士人和民众中影响较深。自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以来，湖南

^① 引文及数据均引自陶用舒：《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岳麓书社灵柩年版，第灵柩-猿猿页。

人自诩功业盖世，产生了“虚骄之气”，因而固守传统，满足于对传统教育的点滴改良，有些士人甚至对西学、西艺“恶谈独烈”。这种状况，直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湘军在牛庄（在今辽宁省）大败之后，才得以改变。

湘军牛庄溃败，湖南全省震惊，虚骄之气顿挫，救亡之志大振，使一批改革中坚得以脱颖而出。1895 年维新志士江标出任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并创办《湘学报》宣传改革维新。1897 年熊希龄、谭嗣同等开始筹办时务学堂，1898 年 5 月正式开学。时务学堂以其崭新的办学理念、教学内容和雄厚的师资力量，“为四方视听所系”，从而激发了湖南全省兴办现代学校的热潮。据统计，在 1908 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前，全省共有学堂 400 所，学会 100 个，还有许多府、州、县大力改革书院，教授新学。诚如梁启超所言，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是“最富朝气的省份”。

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虽然使湖南的现代教育一度受挫，但一年以后，慈禧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终于在形势的逼迫下，下诏实行新政。自此，湖南的现代教育又如雨后春笋，遍山勃发。师范教育迅速崛起，中小学办学体系迅速完善，中学数量居全国第二，幼儿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1908 年前后，湖南学子还掀起了赴日留学高潮。据 1908 年学部《官报》统计，当时全国留日学生人数 2000 人，其中湖南 300 人，占 15% 左右。这些湖南学子，学师范专业者较多，为进入中华民国以后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人才条件。

中华民国统治的 1912 年，是湖南政局动荡、战火纷飞、人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但湖南教育事业始终蓬勃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居于全国前列，平民教育有“策源地”之称，高等教育虽然规模不大，但教育质量较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 1938 年举行专科以上学生学业竞赛，湖南学生的竞赛成绩均名列前茅。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湖南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虽然受过“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干扰，但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到 1957 年，湖南已加倍实现 19 世纪初期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教育理想，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扫除了青壮年文盲。九年义务教育以外的各类教育与 1949 年比，都成 1 倍甚至 2 倍增长。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也显著提高，1950~1957 年，湖南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各学科竞赛，共获得金牌 10 枚、银牌 15 枚、铜牌 10 枚，为全国之冠。1957 年湖南高等学校的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 10 人，亦居全国前茅。

上述湖南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原始社会，湖南农耕文化和家庭、社会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全国是比较先进的。这大概是因为湖南人类起源较早所致。而当中国进入文明史以后，湖南教育先是长期落后，继又后来居上，其原因和条件何在呢？这里先引述近代学者、无锡人钱基博先生所著《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导言”中的一段话：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蔽塞，常不为中原文化所泽被。亦抑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古茹今，罔不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深湛古学，而能自辟蹊

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钱先生的这段话，基本揭示了湖南古代教育发展的规律：交通阻塞，无论对外交流和境内各民族的交往都很不便，极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和较大部落集团乃至国家的建立。加之湖南境内“群苗所萃”，“民性倔强”，故长期“不为中原文化所泽被”。这种状况，直到全国经济、政治重心完成南移的宋代才得以改变。而宋代“风气自创”、“自辟蹊径”为湖南教育开创兴盛局面的“大儒”则首推被称为“理学宗主”的北宋道州人周敦颐。接着兴起的则为南宋创立理学湖湘学派的外省来湘定居学者胡安国、胡宏父亲子和张总。

周敦颐、胡安国父亲子和张总为湖南开创古代教育兴盛局面之后，历元、明、清三代不衰。而当中国历史进入近现代以后，湖南的现代教育虽然遭受过挫折，但也一直保持着兴旺发达之势。回顾这一千多年湖南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初步总结出如下六条历史经验：

（一）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宋代湖南教育的兴盛，与理学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而理学乃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它上承孔子“践仁以知天”的天人合德之教，同时融会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的精微阐思，创立了儒家宇宙论哲学，使儒家思想成为包括自然、社会和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哲学体系，终于使中国思想界在经过魏晋南北朝以后漫长历史时期的混乱以后，儒家思想重新取得了主导地位，对稳定和巩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理学在北宋尚处于创立和奠基阶段，来不及广泛传播，故周敦颐对发展教育事业未留下显著业绩。他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为理学奠基上。他面对当时复兴儒学的时代需求，著作《太极图说》，以“图”和“说”的形式论证了从“无极”到“太极”，再到阴阳二气，再到水、火、木、金、土，再到化生万物，“人秉至灵之气”，故能从中体认出道德规范的过程，发明了儒学的宇宙论哲学，完成了儒家伦理寻根探本的任务，为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的学校教育，自汉代“功令之学”兴起，特别是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来，逐步沦为“科举器争，富贵熏心”的名利竞争场所。理学家对此十分不满，乃另辟蹊径，推行一种新的办学形式——书院。南宋理学已进入成熟阶段，开始大力传播，书院乃成为理学的传播基地。胡安国、胡宏、张总等都是书院的创建者和主持人，为教育的改革创新立下了功勋。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深重的民族灾难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以现代教育取代旧传统教育。湖南在这种改革举步维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一大批与时俱进的创新人物，如魏源、郭嵩焘、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将湖南的教育改革推向全国的先进地位。

（二）一个优良的学风。宋代湖湘学派的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总等以其理学思想和“明体达用，济人利物”的教育理念培植了一个优良的学风，在湖南世代相传，中经王夫之、陶澍、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不断完善，发展成为湖南区域文化——湖湘文化，其基本内涵，可以归纳为：“忧国忧民、经世致用、刻苦自励。”“忧国忧民”是湖南学子士人对屈原《楚辞》的“忧国忧民”思想的继承。无“忧国忧民”之情者，必无“经世致用”之志，故“忧国忧民”乃这个优良学风的前提。“经世致

用”是这个学风的核心。“经世”一词，《辞源》释义为“治理世事”，作为学风的“经世致用”，就是强调读书学习必须密切联系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学以致用，救国救民。它与汉学的埋头于训诂考据，心学的空谈义理心性和科举制度带来的士人“汨没于八股词章”是针锋相对的，至今尚有进步意义。“刻苦自励”则是这个学风的落脚点。曾国藩曾作《勉强》一文以阐述“刻苦自励”的重要性，他指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故学子的“刻苦自励”实为成才之本。

(三) 一批志行高远、学识超群、以为国育才为己任的办学中坚和教学中坚。教育是群众性事业，需要大量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之服务。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需要有人带领、指点和策进，才能做好工作。有大师级人物来提纲举领当然是好事，但大师级人物不会常有，也不会很多。而办学中坚和教学中坚，既能贯彻大师级人物的教育思想，又能带领、指点和策进广大教师。湖南自宋代以来，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总、王夫之、魏源等教育界的大师级人物迭起，而贯彻他们的教育思想并带领广大教师前进者则有岳麓书院的历任山长，民国年间的胡元絃、朱剑凡、陈润霖、何炳麟、周方、罗□重等名校校长。这些办学中坚和教学中坚对教育事业的功勋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四) 一所或一批以自己的优良学风和办学经验带动所有学校前进的名校。自宋代直到清末，岳麓书院一直是湖南惟一的学术中心、教学中心和人才中心，为全省学校的楷模。进入近代以后，戊戌维新中诞生的湖南时务学堂，办理时间虽短，但以其崭新的办学理念、教学内容和雄厚的师资力量，“为四方视听所系”，带动全省出现教育改革热潮。民国年间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和长郡、明德、周南、岳云和楚怡等中学和罗□重主持的湘乡县陶龛小学皆一代之秀，对湖南全省的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有的现在还在发挥作用。

(五) 一些有远见的地方长官对教育的重视和财力支持。岳麓书院是北宋太祖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的。元年以后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规划岳麓书院，使之成为全国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南宋初年岳麓书院毁于战火，理学家胡宏曾请求修复书院，自任院长主持教学，因奸相秦桧反对而未能实现。后来以“崇儒重道”为己任的刘珙出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乃重建岳麓书院，并聘请张总主教，终于使岳麓书院成为延亘千年的全国著名学府。这三位地方长官对湖南教育的贡献是重大的。

重视教育的谭延□民国初年主持湖南军政三起三落，湖南的教育事业也随之起落。谭氏第一次督湘的民国元年和民国二年，全省学生数和教育经费支出数均居全国前缘位。民国三年袁世凯换汤易铭督湘，到民国四年湖南教育事业就倒退了，全省学生猛降~~死~~，教育经费支出猛降~~还~~。由此可见，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人治”国家，地方长官的重视与否，对教育事业的兴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六) 一个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宋代以来，尊师之风逐步在湖南社会兴盛。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元祐），宋真宗赵恒亲自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周式学行兼优，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周式无心做官，坚持要回岳麓书院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感动，答应其回山请求，并赐给对衣鞍马、内府书籍，还为亲书“岳麓书院”匾额。这种礼遇，在当时是少见的，对推动全国特别是湖南尊师重教风尚的发

展起了重要作用。南宋乾道三年（1163），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来到长沙与张总交流、会讲学术于城南、岳麓两书院两个多月。两位大师往返城南、岳麓书院过湘江的渡口被后人命名为“朱张渡”；两位大师吟诗唱和的“赫曦台”，也因后人纪念大师而定名。南宋时理学以湖南一派为最盛，四方学子来湘求学者极多，衡山一位普通富户侯宣，为方便四方学子，乃专门“筑室一区，俾游学之士往来馆焉。来者踵至如归，侯宣延之二十年不倦”。这些就是宋代湖南社会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昌盛的例证。

降至清代中晚期，湖南巨室富户无不设家塾以课子弟，宗支祠堂无不设族学以教后代，市井村落无不设村塾以育童稚，未入仕途的士人和丁忧、罢黜在家的官吏，也都乐于开设门馆以授生徒。民国二十一至三十四年，湖南全省捐资办学猿万元以上的普通百姓共 1 万人，占全国同期捐资猿万元人数的 1/3。民国年间湖南的中小学教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其中私立中小学始终多于公立，民间重教之风，可谓非常兴盛。

几千年来，湖南教育的经验是丰富的，不少人物办学的业绩感人至深，值得后人继承和传颂。但是比较而言，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湖南古、近代教育的规模终究是狭小的，功能也不全面，因而教育真正在全省范围内的普及和提高，以及各种类型教育的兴办和全民教育网络的建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特别是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当然，由于我们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兴办如此大规模的教育，困难和问题也不少，但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明确地认识到教育在兴国大业中的重要地位，那么这些困难必然会在前进的道路上逐一得到克服，从而创造出新的经验。

第一章 摇先秦时期的湖南教育

追溯湖南教育的起源，须从教育与文化的关系说起。

教育与文化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文化，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积累、遗存下来的知识经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都是文化的内容及其具体表现。教育，从广义说来，与文化是同一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狭义说来，文化则是教育的依据和内容，教育是文化的存在和传承形式，即教育是文化传递、继承、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外在方式。在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远古时期，文化内容非常广泛而简单，从而决定其教育内容也非常广泛而十分简单。当时，凡是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经验、知识、能力、技艺、品德、习俗、信仰等，都要求全体氏族成员必须掌握，因而这些原始的生产和生活经验、知识、能力、技艺、品德、习俗、信仰等就成为教育的内容。因此，人类从哪里开始，教育就从哪里开始。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古湖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教育逐步产生发展起来。

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①，在沅水、澧水、资水、湘水流域，湖湘先民率先进入了旧石器时代。他们在原始的生产和生活中，逐步学会了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逐步产生了团结对敌等习俗观念，并且在这种社会性的生产生活中，这些技术、观念代代相传。这样，湖南原始的教育诞生了。但当时教育尚未从生产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分化出来，没有专门的机构、施教人员和固定的施教场所；教育内容非常广泛但十分简单；教育手段、教育方法主要是口耳相传和行为模仿；教育具有全民性和平等性，即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接受同样的教育。

商周时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看出，由于石器工具制作技术的提高和青铜器具的出现及逐渐运用于生产，湖南地区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逐渐成为主要产业，牲畜养殖业得到快速发展，狩猎和捕鱼等渔猎业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和教育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到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全境被纳入楚国的势力范围。此时的湖南可谓逐步跨进了“文明”的门槛。政权的建立，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使古湖南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且还涌现出像鬻熊、申叔时那样具有丰富教育思想、堪称教育家的人物。

^① 参见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猿- 愿页。

第一节 摇先秦时期的湖南教育概述

一、远古至商周时期的湖南教育

(一) 从神话传说、考古发掘材料窥探湖南先民的文化教育

摇摇我们无法知道湖南远古时期教育的确切状况，只能透过神话传说和考古发掘材料去窥探和搜寻他们的踪迹。

神农氏炎帝是在湖湘大地广为流传的神话人物之一。根据文献记载，火的使用、农作物栽种、陶器制作、商贸交换等都与他有关。史载：“炎帝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治麻为布，制作衣裳；日中为市，首倡交易；削桐为琴，结丝为弦，作五弦琴；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制造弓箭。”^① 传说炎帝与黄帝是同胞兄弟^②，后来分别成为两个原始部落的首领。两大部落在长期的交往中关系日渐密切，共同形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部落联盟——炎黄部落联盟。这就是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的缘故。神农氏炎帝部落后来南迁到了湖南，在湖湘地区传播推广农耕技术，为这些地区的开发和农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炎帝因为治民病口尝百草而中毒身亡，为湖湘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最后长眠于他为之操劳的大地上。^③ 今湖南一些地名如嘉禾、耒阳等的由来，均与炎帝部落在湖南的活动有关。据王应章《嘉禾县学记》载：“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这一记载与《逸周书》所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而种之”相符。可见，“嘉禾”即神农最初教民播种五谷的地方。又据《衡湘传闻》记载，神农氏的后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明一统志》：“耒水出郴州耒山。”可见，“耒水”、“耒山”，均因神农后裔在其地制作农耕工具耒耜而得名。而耒阳县即因处耒水之阳而得名。

神农以善耕种而闻名。从事农业生产，必须掌握农作物的生长特点与生长周期，必须掌握生产管理知识、经验和技能，还必须掌握天气、季节变化的特点和规律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天文学就成为当时的带头学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④ 因为如果不懂得天文知识，就不能辨别方向去远处打猎，不能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季节和气候去打猎；也不能按照植物生长规律来合理安

① 引自湖南省炎陵县炎帝陵《炎帝陵特种邮票发行纪念碑文》。

②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③ 据《帝王世纪》载：神农氏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宋人罗泌《路史·后纪三》载：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有唐尝奉祠焉”。他的儿子罗苹注说：炎帝庙“在康乐乡鹿原陂上，（宋）乾德五年建”。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排农时。传说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表明神农时期人们已经初步掌握了有关天文、气象、土壤等方面的知识并运用于农业生产中。而农业生产的这些知识、经验的传授与掌握离不开教育活动，这些知识、经验、技能无疑也就是当时教育的重要内容。

《太平御览》引《周书佚文》说：“神农耕而作陶。”《世本》又说：“神农作琴。”在湖南新石器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陶器。早期主要是夹砂和夹碳红陶，多为手制；中期以后出现了彩陶，采用慢轮修整。加工烧制陶器，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艺，需要具有多方面的经验、知识。例如，制造陶器、砌窑、烧窑，需要具有一定物理方面的经验和知识；设计陶器形状，绘制几何图纹等，需要具有一定数学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利用渗入色剂或天然矿物质制成釉，涂绘于陶器坯上经烧制发生化学反应成为彩陶，需要具有一定化学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因此，制作者必须接受过专门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才能掌握各道工序的复杂技能。“神农作陶”，说明在神农时代，湖湘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制陶技术被世代传承下来。而“治麻为布，制作衣裳”，则表明当时已经初步掌握了原始纺织技术。而“削桐为琴，结丝为弦，作五弦琴”，则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较高的审美意识和艺术鉴赏能力。毫无疑问，制陶技术、麻纺技术以及原始审美意识等也是当时的教育内容。神农氏炎帝时期湖南尚未进入金属时代，因此教育内容中除火的使用、农作物栽种、陶器制作、原始纺织等方面的经验、知识、技术外，没有见到有关其他知识技术的传授记载。

舜帝也是在湖湘大地广为流传的神话人物之一，是距今源源多年前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传说舜帝乘木筏溯湘水、潇水而上至九嶷山，教当地农民制茶，在舜源峰下紫霞岩办学，最后不幸在为百姓降伏巨蟒时中毒而死。《帝王世纪》载舜帝所作《南风歌》曰：“南风之惠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财兮。”诗歌并不一定是舜帝所作，但记述的却是当时舜帝南巡采摘草药为民治病。利用农时种植作物改善百姓生活的情形，同时也表明当时处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时期。《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疑），是为零陵。”九疑即今湖南宁远县九嶷山，舜源峰下的舜帝陵传说始建于夏朝，是中国最古老的陵墓，陵内有“帝舜有虞氏之陵碑”，相传为汉朝零陵郡守徐俭所立。

《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历代思想家都称颂舜帝“以君子之人德，为帝王之称首”，十分推崇他实行“选贤任能”的“公天下”、将帝位禅让于禹的开明方式，“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重德治尚教化”和“舞干戚怀四彝”以“和为贵”等治国方略。传说舜帝还重视音乐、诗歌等艺术教育。《尚书·皋陶谟》载湘君舜帝安排“夔夏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①，“笙簧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这里，“鸣球”、“搏拊”、“琴”、“瑟”、“笙”、“簧”、“箫”都是乐器，《韶》为乐曲名。上面记载说的是舜帝等人一边奏起各种乐器，一边吟咏歌颂祖先或赞美劳动的诗歌，如《南风歌》、《卿云歌》^②。不管我们对艺术的起源作何理解，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艺术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有感而发的产物，是人们表达情感的需要。但是，

① 据学者考证，史书（如屈原的《九歌·湘君》）中的“湘君”应是指舜帝重华。见黄露生《舜帝与楚文化》，载《越风》贰零四年第Ⅷ期。

② 《尚书·大传》载舜帝作有《卿云歌》。

弹琴、唱歌、跳舞除此意义之外，或许还是“图腾活动的表现，具有巫术作用或祈祷功能”，即原始宗教信仰教育的功能。^①如《卿云歌》的“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和后来屈原《涉江》称颂舜帝“与大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以及长沙楚墓出土《帛书》称“帝舜乃为日月之行”一样，都是通过歌颂舜帝的伟大事迹，对年轻一代进行祖宗崇拜教育，激励他们学习和继承先人遗志，贡献社会，报效国家。

传说上古时期湖南地区还出现过“三苗国”。三苗部落活动时期大致与尧、舜、禹同时，分布和活动的地区大致是江淮、江汉平原和长江中游南北及洞庭、鄱阳两湖之间，即今河南省南部、安徽省西南部和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之地。后来“三苗国”很可能逐渐发展成为以长沙为中心的地区。《战国策·魏策一》曰：“昔者三苗之后，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持其险也。”所谓“彭蠡”，即今江西鄱阳湖；所谓“洞庭”，即今湖南洞庭湖；所谓“衡山”，即今湖北（一说安徽）霍山；“汶山”因在“彭蠡”、“洞庭”之南，即今湖南衡山。《通典·州郡十三》说：“潭州，古三苗地也。”明周昕《名义考》也说：“三苗建国在长沙，而其治则江南荆、扬也。”

从文化学、民族学角度看，“苗”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据《淮南子·原道训》：“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原来，“苗”与种植农作物有关。《说文》：“苗，从艹，从田，生于田者。”汉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庄公七年》“苗”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所以，“苗”的本义是指田里长出来尚未吐穗结籽的禾，泛指田里播种的谷物，后来人们用以指擅长农作物种植的民族或部落（国家）。湖南自古是一个以农业发达著称的地区。考古发现，早在距今约八千年前，湖南就开始种植农作物。如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植物种子，并在红烧土块及支座残断面中观察到了稻谷壳的痕迹，这说明当时在地势宽阔平坦的湖泊地带边缘有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的存在。^②距今约七千年前的澧县城头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最早的“稻田”。关于炎帝、舜帝的传说也表明这一点。三苗时期的文化大致反映在湘乡岱子秤、长沙腰塘与团里山、浏阳樟树潭等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铲、石镰、石锁、石刀、石矛、石凿等，其制作技术有所改进，显然这些都是当时用来进行砍伐森林、开辟荒地、翻犁土地、收割谷物的农业生产工具。其中马鞍形石刀、穿孔宽刃石锄、三角形带铤石镰等，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很大作用，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从教育的角度看，为了使农业生产得以继续，必须让年轻一代学习和掌握制作农业生产工具与种植农作物的经验、知识和技术，因此这些经验、知识和技术就成为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学习、掌握和使用这些经验、知识和技术就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与三苗人生活活动有关的经验、知识和技术，如陶器制作技术、房屋建筑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数学和力学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③远古时期，湖湘先民随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85-586 页。

② 参见裴安平：《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载 1983 年《中国考古学年鉴》。

③ 恩格斯说：“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它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4 页。